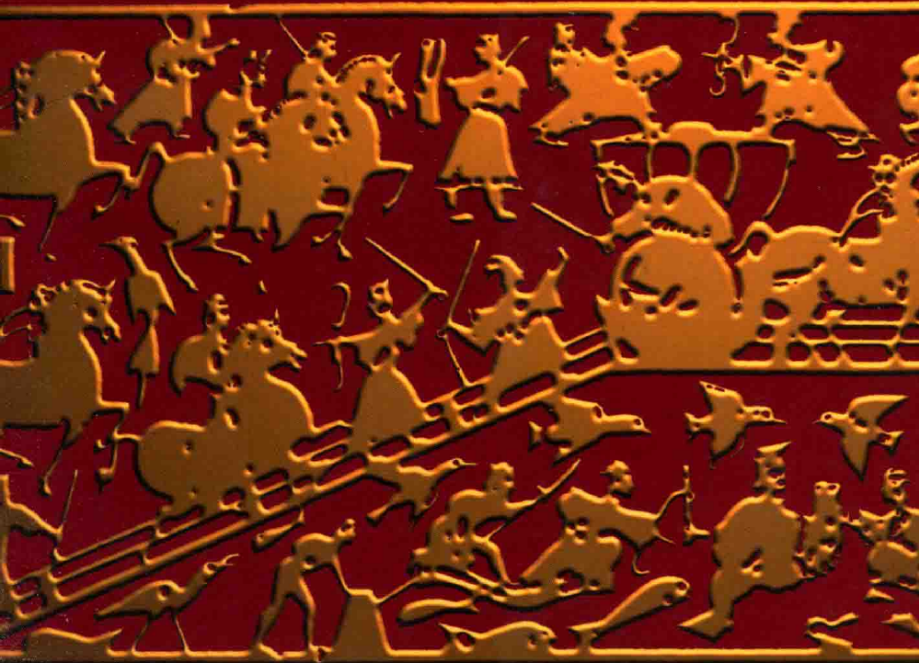


诸葛亮

三国文化 (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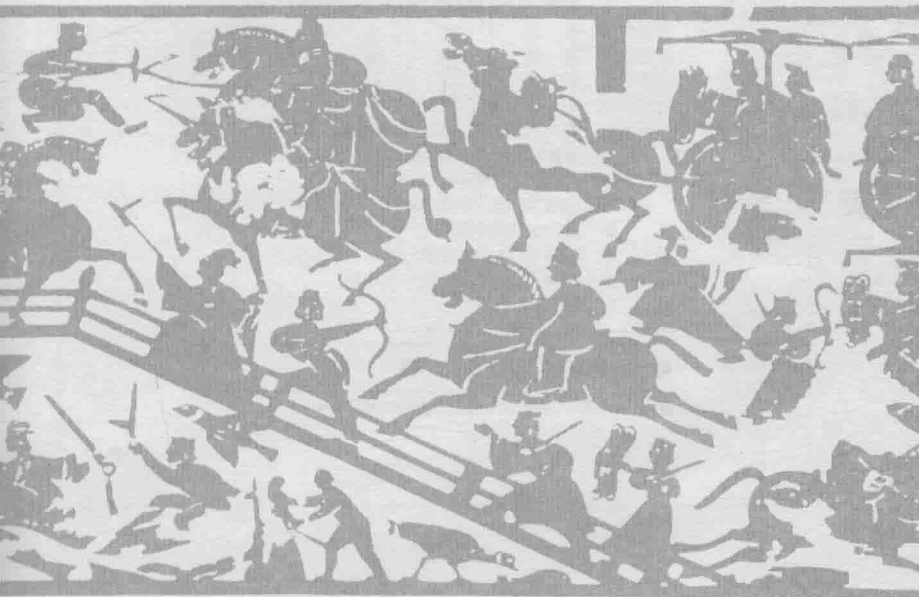
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编



诸葛亮 与蜀文化 (二)

罗开玉 李兆成 梅铮铮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诸葛亮与三国文化(2)/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等编.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10

ISBN 7-5364-5626-3

I. 诸... II. 成... III. ①诸葛亮(181~234) -
人物研究②中国 - 古代史 - 三国时代
IV. ①K827=362②K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5322 号

诸葛亮与三国文化(二)

编 者	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责任编辑	宋 齐
封面设计	梁 成
版面设计	梁 成
责任出版	李 珉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00 千
印 刷	四川省印刷制版中心
版 次	2004 年 10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ISBN	7-5364-5626-3/K·78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洪武書畫三圖文化
(二)
』

編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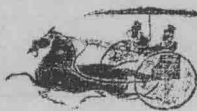
主任 張麗君

副主任 羅開玉

委員 張麗君 丁浩 羅開玉 李亞紅

李平 梅錚錚 賀游 李兆成

卫永鋒



目 录

纪念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建馆 20 周年(代序)	张丽君/1
论陈寿与《三国志》	杨耀坤/7
《三国志·蜀书》札记	方北辰/36
《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管见(二)	卿三祥/59
蜀汉职官制度研究	罗开玉/77
蜀汉政治考论	李兆成/107
“限江自保”与“争衡天下”	卫永锋/161
诸葛连弩及其再发明初论	罗开玉 李希勇/192
杨升庵与诸葛亮八阵图	张德全/208
汉魏时期长江流域佛教遗物	杨秋莎/214
清代、民国时期成都武侯祠的旅游活动	吕一飞/223
读惠陵史料札记	李兆成/233
清初武侯祠住持张清夜其人其事	梅铮铮/249
蜀汉文学与建安文学	李景禹/264
四川曲艺中的三国曲目漫谈	蒋守文/287
元明时期的“貂蝉戏”及其文化透视	李祥林/296
三国戏谈片	唐剑青 蒋维明/304
《三国演义》在韩国的流传和影响	彭建平/313
折而不挠 德善遗世	张 东/317
曹魏时期的图书事业	雷 玲/326
郾道元与三国	梁中效/335
《蜀中广记》之三国资料辑存 ... [明]曹学佺著 卿三祥辑/339	
后 记	390



纪念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建馆 20 周年

(代序)

张丽君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自 1984 年建馆后,古老的祠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二十年来,祠内古建筑得到妥善保护和修缮,馆藏文物日益丰富,研究工作硕果累累,园林绿化独具特色,参观景点日益增多,三国文化旅游纪念品不断创新,服务质量屡获褒扬和嘉奖。尤其是近几年,武侯祠博物馆更是紧紧抓住机遇,积极做大做强三国文化,文博工作得到迅速、全面的发展,面积也从 50 多亩增加到 210 亩。

在不断地为人们提供优质精神文化产品的同时,武侯祠博物馆还肩负积极探索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之路的使命,努力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提高。

一

把武侯祠建设成三国文化资料的收藏、研究中心和展示中心,是武侯祠博物馆二十年来奋斗的目标。经过长期不懈的工作,特别是近年来的努力,这一目标已初步完成。

大力加强藏品的征集。藏品是博物馆业务活动的基础,其质量的高低和数量的多少,是衡量博物馆社会地位及其作用的一个主要条件。近年,我馆大力加强了文物征集工作,已征集到有关三国文化的文物及文物资料上千件,大大地丰富了馆藏。其中,近年来惠陵墓砖、蜀汉铭文弩机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和征集,木牛流马和诸葛连弩的



收集尤具代表性。

惠陵墓砖 2001年3月,我馆进行清明植柏活动时,在惠陵封土边缘发现了四匹蜀汉墓砖。这几匹砖与成都平原出土的东汉晚期砖非常近似,都为修建墓室所制。陵墓建成后将剩余砖块垒于墓室顶表层,历代相当常见,可见这些砖是修建惠陵时所余之砖,印证了《三国志》等历史文献中关于惠陵记载的可靠性。

蜀汉铭文弩机 2002年4月,武侯祠征集到一件蜀汉铭文弩机。弩机是发射箭簇的机械,由望山、牙、悬刀和钩心组成。三国时期,诸葛亮曾亲自“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为抗击曹魏,诸葛亮还建立了弩军,其士兵多由今云、贵、川等地的少数民族组成,战斗力极强,为蜀军之精锐。这件弩机最大长度15厘米,其铜廓上刻有铭文“延熙十六年(253)四月廿日中作部兴业……”等30多字。传世和出土的蜀汉文物本来就并不多,有铭文的蜀汉弩机更少,因此这件文物尤为珍贵。

木牛流马和连弩 诸葛亮的发明创造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木牛流马和连弩,这两项发明至今皆已不存。2003年,我馆先后征集到陕西徐明富复原的木牛流马和辽宁李希勇复原的连弩数件,虽然并不是诸葛亮所发明的原件,却为我们以后研究木牛流马和连弩提供了参考。尤为重要的是,木牛流马和连弩作为三国时期的重要发明,可开发成文化产品,有利于拓宽我馆文化产业的发展道路。

《武侯祠志》 我馆非常重视对诸葛亮与三国文化的研究,重视对祠内相关文物的研究。多年来,出版有关论文集、学术专著和相关读物50多本,发表论文200多篇,多次获省、市社科优秀成果奖。近年,我馆又加强了对成都武侯祠历史渊源和历史沿革的研究,目前正在撰写的《武侯祠志》将是武侯祠历史最详尽、真实的记录。武侯祠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志书——《昭烈忠武陵庙志》,于清道光九年(1829)由华阳县举人潘时彤修纂并雕版成书,这部详细记载武侯祠历史的专志共分十卷,对我们了解武侯祠相当重要。但这部志成书一百多年前,其后武侯祠变化很大,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发展变化进行整理和记录,尤其是客观的反映和记录近年来武侯祠的巨大变化。



同时,道光《昭烈忠武陵庙志》的内容和体例等方面也有诸多不足之处,应予补充、订正。目前,我们正组织有关专家、学者重修《武侯祠志》,已整理的文字资料达 20 万字,计划两三年后面世。

文物古建保护方面成绩卓然。近年来,我馆积极争取立项并自筹经费,对刘备墓、诸葛亮殿和东西厢房等古建筑进行了全面的保护性维修,对全馆壁画和匾额对联进行了保护和建新,修整了红墙夹道,将全馆水泥路面全部更换成了青石板路。为了确保文物的安全,我馆积极完善保卫设施,建立了“四系统、一中心”,即红外线防盗报警系统、红外线烟感防火报警系统、防火自动灭火系统、夜间电子巡更系统和电视监控中心。

专业化讲解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提高。2000 年初我馆在全市文博系统率先进行人事改革,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择优录取了一批讲解员,大力推行专业化讲解,为游客提供了优质的解说服务,讲解的语种也发展到多种,讲解批次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过去每年讲解 800 多批,提高到现在每年完成约 2 万讲解批次。我馆专业化的讲解服务不仅受到广大游客的欢迎,也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讲解服务成为一种市场行为,丰富了文化产业的具体内容。

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我馆抓住机会在各种媒体上广泛宣传,还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氛围浓厚的活动,宣传文博工作的发展,增加与市民的亲和力。如组织庆祝建庙 1780 周年、纪念“攻心”联问世一百周年、每年一度的春节“游喜神方”活动,还经常举办花卉、盆景、奇石、根雕等各种展览。这些有组织的重大文化活动,其间有文化产品的交流,有新的商机的出现,种种经济往来以文化为桥梁不断产生。同时,各级新闻媒体也纷纷予以关注,争相报道,扩大了影响。武侯祠生动活泼的崭新面貌,综合性的强势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面貌,带来了一次次的聚焦,一个充满活力的品牌在逐渐产生。

抓住机遇积极扩大武侯祠在海外的影响。我馆积极参加省、市旅游促销团,赴欧洲地区、日本、韩国推介三国文化旅游景点。三国蜀汉文化深受韩、日和东南亚国家的尊奉,这些地区更是我馆海外宣



传工作的重点。2002年到2003年,我馆在韩国汉城举办了以《三国志英雄展》为题的文物展,时间长达80天,影响极大。这次展览共展出文物展品86件(套),其中包括二级文物2件、三级文物34件(组),展品中有46件(套)由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提供。展览期间,日参观人数最高达1500多人,前后共计有3万多观众观看了展览。有不少客居韩国的中国台湾客人以及法国、美国、南美哥伦比亚等国的客人也来观看展览,甚至有观众特地从大邱市、光州市等地驱车到汉城观展。通过展览和宣传,有利于海外游客加深对三国文化的了解,也进一步扩大了四川、成都和武侯祠博物馆在韩国的影响,扩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的影响。

此外,武侯祠还积极维护名胜古迹的文化氛围,不断加强内部景点的建设和改造。在原有景点的基础上,近年来迁建了清代建筑三义庙,新建结义楼、桃园、听鹂馆,改造碧草园、香叶轩,完成了“锦里”一条街土建工程,2004年“锦里”将全面开放。这些新景点的增设,使武侯祠占地面积从50余亩扩大到80余亩。

文化产业化是文博单位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近年来,我馆领导开拓思路,拓展领域,挖掘潜力,明确要求研究部门专家、学者在搞好传统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并尽快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加大投资,打好三国文化牌,力争把武侯祠建成能够体现四川特色的文化旅游纪念品基地。据统计,全馆开发和销售的三国文化旅游产品已达六大类、百余种类。这些产品用于纪念、观赏、馈赠,极大地满足了不同消费对象的各种需求,深受喜爱,走势良好。在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旅游纪念品大赛中,参赛产品获一金三银的好成绩,是全省参展单位第一名,位列全国前茅。另外还采取与企业合作的方式,共同开发文化旅游纪念品,目前开发了“孔明香”茶、“结义”酒。特别是馆内的三国文化旅游纪念品超市,为全国文博系统首家成立,引起各界人士和媒体的强势关注。借助文化产品的翅膀,武侯祠把自己的形象带向四方,文化产品的销售收入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成为文化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进一步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武侯祠博物馆发生的巨大变化,受到社会各界人士、文博界以及



新闻界的好评,获得国家、省、市各级部门授予的荣誉百余项。近两年,国家、省、市领导前来武侯祠参观、视察,对武侯祠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高度赞扬武侯祠博物馆在文物保护、利用和管理等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和成绩,认为武侯祠博物馆通过自身努力,做了大量富有创见的工作,为我省文博单位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范例,作为我省的文博品牌单位已经走在全省文博单位的前列。

二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重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成都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系列具体任务,也对武侯祠博物馆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这就是要“做大做强三国文化”。

三国文化内涵丰富而深厚,具有精深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和丰硕的艺术成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武侯祠就是三国文化的突出代表。为了进一步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精神,增强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自豪感,也为了发挥成都历史名城的优势,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提升成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武侯祠博物馆和南郊公园于 2003 年 11 月 27 日正式合并,组建了新的武侯祠博物馆,面积扩大到 210 亩,为进一步的发展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宝贵的机遇面前,武侯祠博物馆正在完成一系列重要任务。

首先,“锦里”的装修工程和经营定位即将完成,通过提炼整合各种文化元素,开发式地“抢救”民俗文化遗产。将再现几千年蜀地民俗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变迁,重现古蜀辉煌的历史风貌。“锦里”是依托“武侯祠”这一成都文化旅游黄金品牌而修建的一个蜀地民俗文化的“博物馆”,是武侯祠文化内涵和品牌的延伸。位于武侯祠大门东侧至三义庙后,占地面积约 9235 平方米,街道总长约 340 米,道路宽度约 2—3 米,总建筑面积约 7920 平方米。“锦里”以川西民居古街建筑风貌为主,为三国、蜀汉文化韵味浓郁的蜀锦、蜀绣、



蜀笺、蜀酒等民间传统工艺制作和成都名小吃提供展示场所,又体现了蜀地民风民俗,还可作为旅游产品的销售及影视拍摄基地,也是人们赶花会、庙会的好去处。在“锦里”,游人也可参与一些工艺品的制作,增强了互动性。

其次,我馆还积极努力打造最有特色的三国文化主题博物馆和三国文化旅游休闲中心,创造更知名的国际文化品牌。

“做大做强三国文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我们从以下方面不断的努力:

1. 不断加强武侯祠作为三国文化资料收藏、研究和展示陈列的中心,突出多功能、高科技、高品位的特点。按照古籍记载,依托惠陵,进一步建设陵寝文化区,打造皇家园林区。对“锦里”一条街的建设进一步延伸,形成更具规模、更高档的西蜀民风民俗的文化产业带。同时,还要加强对武侯祠周边环境的整治,建造可停放相当数量旅游车辆的专用停车场,在武侯祠前建设下穿式通道,设置主题广场和步行街,周遭广植松柏,重现“锦官城外柏森森”的美景。

2. 加强班子建设和队伍建设。遵照市委十届二次全会的要求,做到“班长抓班子,班子带队伍,队伍促发展”,建设一支团结的高素质文博干部和职工队伍,规范化和高质量地为游客服务好。

3. 不断巩固实绩,创造条件,举办宣传三国文化、宣传成都的各种大型文化活动,进一步带动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2004年将组织举办“国际三国文化节”,把三国文化和成都的美名传扬到世界各地去。

武侯祠博物馆建馆20年来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各级领导和广大市民的关心、支持,是全馆员工在领导班子的带领下风雨同舟、历经艰辛取得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对文博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提供了发展文化产业的大好时机,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武侯祠博物馆仍将一如既往地按照“保护、开发、利用”的思路,努力“做大做强三国文化”,进一步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更上层楼,为成都现代化发展作出有益贡献,为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多作贡献。



论陈寿与《三国志》

杨耀坤

一

《三国志》共65卷,其中《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记述了汉献帝建安元年(196)曹操执政至吴末帝孙皓天纪四年(280)吴国灭亡共95年的史事。

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市)人,生于蜀汉后主建兴十一年(233),卒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终年六十五岁。

陈寿少时就很好学,曾以同郡史学家谯周为师。谯周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曾据旧典作《古史考》二十五卷,以纠《史记》之误。^①陈寿在谯周的影响下,主要学习研究《尚书》、《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古代文献典籍。在谯周教过的很多学生当中,陈寿、文立、李虔、罗宪等最为优秀。诸生把文立比作颜回,把陈寿、李虔比为游、夏,把罗宪比为子贡。^②因为孔子的学生子游、子夏对古代文献典籍很熟悉,故以“文学”著称。^③陈寿也熟悉古代文献典籍,特别对《史记》、《汉书》更为精熟,^④所以被喻为游、夏。陈寿还很聪明机警,文笔又好。《华阳国志·陈寿传》说他“聪警敏识,属文富艳”。

① 《晋书·司马彪传》。

② 《晋书·文立传》。

③ 《论语·先进》。文学,即指古代文献。

④ 《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



陈寿在蜀汉后主时期,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侍郎与黄门侍郎。^①散骑侍郎与黄门侍郎,在三国时期为权要之职。但自宦官黄皓窃取权柄后,陈寿就遭排斥。《晋书·陈寿传》云:“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被谴黜。”蜀汉政权正是在黄皓的窃据下,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蜀汉后主炎兴元年(263),政权被曹魏灭亡。这时陈寿三十一岁。两年后,曹魏政权亦被司马氏的晋王朝所取代。晋王朝开国之君即晋武帝司马炎。

蜀汉未亡时,陈寿父亲已去世。在丧期中,陈寿得了病,曾使侍婢调制药丸而被外人看见。当时人认为此事违背了礼教,便对陈寿加以贬责。这在强调孝道、重视丧礼的西晋时,尤被统治者计较。故蜀汉灭亡后数年,陈寿一直未被录用。泰始三年(267),晋武帝召陈寿的同学原蜀汉巴东太守罗宪入朝,进位冠军将军、假节。泰始四年,晋武帝又召罗宪到华林园陪宴。在宴饮中,晋武帝先问罗宪蜀汉大臣子弟的情况,又问蜀土先辈宜举荐叙用的人。罗宪遂推荐了陈寿、常忌、杜轸等人。^②同时黄门侍郎张华又欣赏陈寿的才学,^③就为他所遭受的贬议作了辩解。故陈寿于泰始四年或五年被举孝廉,出任佐著作郎,兼本郡中正。^④

自东汉初年以后,蜀郡郑伯邑、赵彦信,汉中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王文表等,皆博学洽文之士,而又留意乡邦文献和人物。他们曾撰《巴蜀耆旧传》,叙述巴蜀的耆旧先贤。陈寿认为尚有不足之处,遂并巴、蜀、汉中,合撰《益部耆旧传》10卷。散骑常侍文立上表呈之,晋武帝认为很好,便升陈寿为著作郎,亦兼本郡中正。^⑤

在陈寿任著作郎期中,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又奏使陈寿撰定

① 《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

② 《三国志·蜀书·霍峻传》裴注引《襄阳记》。

③ 《晋书·陈寿传》谓“司空张华”,实误。详见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杨耀坤《陈寿评传》之考证。以下引用此书,径称《陈寿评传》。

④ 此与《晋书·陈寿传》所叙不同,详见《陈寿评传》考证。

⑤ 《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



蜀相诸葛亮故事。陈寿遂着手整理诸葛亮著作,不久调任平阳侯相。^①在平阳侯相任上,陈寿将整理完成的《诸葛亮集》二十四篇于泰始十年(274)二月上奏朝廷,^②又再被调任著作郎,仍兼本郡中正。其后咸宁(275—280)中,即将赴荆州就任镇南大将军的杜预,以陈寿史才通博,向晋武帝荐之为黄门侍郎或散骑侍郎。但在此之前,经李密推荐,晋武帝已用寿良为散骑侍郎,故曰:“昨适用蜀人寿良具员,且可以为侍御史。”^③侍御史即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之副,执掌监察、弹劾。此后,陈寿遂“上《官司论》七篇,依据典故,议所因革。又上《释诂》、《广国论》”。^④

太康元年(280),晋武帝灭了孙吴。至此,自汉献帝初平以来,历经九十年左右的战乱、分裂,国家又重归统一。此时之陈寿四十八岁,正好对此九十余年的历史作一总结。他遂着手整理三国史事,最终撰成“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⑤深得时人好评,谓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⑥夏侯湛当时正著《魏书》,见陈寿之作,深感不如,便将所撰毁弃,并不再续作。张华对《三国志》尤加欣赏,向陈寿说:“当以晋书相付耳。”^⑦并将荐举陈寿为中书郎。权臣荀勖嫉妒张华,因而迁憎于寿,加之《三国志》的《魏书》部分不合荀勖之意。荀勖便授意吏部,出调陈寿为长广太守。^⑧长广郡在青州,治所不其县(今山东即墨市西南)。陈寿便以母年老,辞不就官。其后母亡,陈寿遵母命,葬于洛阳。时议者又以陈寿不归葬母于家乡,加以贬责,陈寿因而又数年未为官。^⑨其后,梁、益二州大中正何攀为之辩护,^⑩朝廷才任命陈寿为太子中庶子,而陈寿尚未到任,即于元康

① 此事之记载,《晋书》与《华阳国志·陈寿传》皆有误。详见《陈寿评传》之考证。

②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陈寿上表。

③ 《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

④ 《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

⑤ 《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

⑥ 《晋书·陈寿传》。

⑦ 《晋书·陈寿传》。

⑧ 《晋书·陈寿传》、《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

⑨ 《晋书·陈寿传》、《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

⑩ 见《晋书·何攀传》,及《陈寿评传》之考释。



七年病逝。^①

二

陈寿能写出《三国志》，绝非偶然。《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史书。我国纪传体史书始创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记载社会各方面的史事。“本纪”列于书首，按年月次序编写帝王简史并记载当时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事件。“表”用表格形式列载人物事件。“书”载典章制度及天文、律历、河渠等。“世家”主要载王侯封国之史事。“列传”主要为人物传记和少数民族的历史。这五个部分，分则自成体系，合则相辅相成，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但全书的主要部分是纪和传，数量也最多，故此种体裁得名为纪传体。因纪传体具有上述优点，所以也是《史记》一问世就深受人们赞赏的一个重要原因。《史记》奠定了纪传体的坚实基础。至东汉时班固修《汉书》，又将“书”改为“志”，并删去“世家”，从此纪传体遂演变为“本纪”、“表”、“志”、“列传”四种体例。《史记》又为通史，自黄帝叙至汉武帝时，而《汉书》则为断代史，仅书西汉一代历史。后代修史者，大多遵循《汉书》，为断代史。所以《史记》、《汉书》就成了后世史书的典范。陈寿少年时，在谯周的指导下，对《史记》、《汉书》特别精熟。他深入研究二书的体例、别裁、通识和撰写方法，打下了日后撰写《三国志》的基础。

在陈寿著《三国志》前，已有一些人写过三国史著作。在魏国，魏文帝黄初（220—226）中和魏明帝太和（227—233）中，曾命卫凯、缪袭草创纪传而多年不成。后又命韦诞、应璩、王沈、阮籍、孙该、傅玄等共同撰写，最后由王沈总其成，定为《魏书》44卷。但此书“多为

^① 《晋书·陈寿传》。《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有不同之说，见《陈寿评传》之考辨。



时讳,殊非实录”。^①在吴国,吴大帝孙权末年曾命丁孚、项峻撰《吴书》,但二人俱非史才,不能胜任。至少帝孙亮时,更命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覈等同撰。后来韦曜撰成《吴书》稿 55 卷,叙赞尚未动笔,就被孙皓所杀。^②王沈《魏书》和韦曜《吴书》都是受命而撰,故为官修。此外,尚有魏人鱼豢私撰的《魏略》38 卷,叙曹操至魏末一代史事^③。这些著述都是陈寿撰写魏吴二国史的主要依据材料。只有蜀国,因未置史官,无有著述,^④故蜀汉一代史事,只有靠陈寿自己采访搜集。陈寿是蜀人,又在蜀汉任过东观秘书郎等职,并且对乡邦文献素来留心,又曾撰过《益部耆旧传》,编过蜀相诸葛亮故事,成《诸葛亮集》24 篇;在太康初,陈寿还编辑过《汉名臣奏事》30 卷;^⑤《魏名臣奏事》40 卷、目 1 卷。^⑥凡此种种,都是陈寿撰写三国史的有利条件。

陈寿虽为著作郎,但他并未受命撰写《三国志》,他之所撰,实为私作。虽然张华、荀勖、夏侯湛看过《三国志》,但陈寿并未上奏朝廷。而荀勖对其《魏书》部分不满意,还要把他调出朝廷任长广太守。可能陈寿因母丧去职归家后,才将《三国志》写为定本。所以在他死后,才可能有尚书郎兼梁州大中正范頔上表朝廷说:“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如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朝廷遂“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而藏于官府。^⑦

《三国志》全书只有纪、传而无表、志,但已具备纪传体的主要部分,并且写得很出色,深受时人赞许。《三国志》的确优于它前后或同时问世的三国史著作,故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说:“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

① 《史通·古今正史》。

② 《三国志·吴书·薛莹附薛莹传》。

③ 见《旧唐书·经籍志》及《陈寿评传》之考证。

④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评》。关于此事有争议,见《陈寿评传》之辨析。

⑤ 《旧唐书·经籍志》。

⑥ 《隋书·经籍志》。

⑦ 《晋书·陈寿传》。



征,或疏阔寡要。惟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晋书》卷82《传论》也说:“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分明竟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江、汉英灵,信有之矣。”的确,《三国志》可上承史、汉,与《史记》、《汉书》并驾齐驱。故后世之读史者,尤重“前四史”。但是,历来也有指责陈寿及《三国志》的。具体来说,陈寿《三国志》的长短得失,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 英雄史观

西汉自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其中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说,以及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更是官方的统治思想。至东汉,这种官方的统治思想又与谶纬神学相结合,牢固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各种著述多在维护宣扬这种思想。史籍中班固的《汉书》,就是这种思想的积极宣扬者。如《汉书·高帝纪赞》就明确说:“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班固的这种观点,即其父班彪《王命论》中所鼓吹者。直到汉末,荀悦撰《汉纪》,还将《王命论》载入。但是,汉末之时,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已发生动摇,谶纬神学也已没落,各家思想复归活跃。曹魏正始(240—249)中兴起的玄学,即是在总结了道家、儒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等后形成的。玄学的兴起,即标志着儒家一统思想局面的结束。这不能不对史学家的历史观产生影响。

陈寿在西晋初撰写《三国志》时,还不能完全摆脱“君权神授”说之影响,书中还有“君权神授”说之痕迹,但在各纪传的评论中,却完全表现出他的英雄史观。如《魏书·武帝纪评》论曹操说: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推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